

《共和国农业要事研究》阶段性研究报告

未经许可
请勿引用

共和国农业史料征集与研究报告

第九集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

前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多年来，中国农业和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为了真实地、完整地记录共和国农业发展的光辉历程，我室正组织开展“共和国农业要事研究”。为了推动该项工作广泛深入地开展，我们将陆续编印阶段性编研成果《共和国农业史料征集与研究报告》，广泛征集共和国农业史料，并通过这一方式广泛征求对史实的真实性、完整性的审核修改意见，以留下科学的信史。

现将陆续编印的《共和国农业史料征集与研究报告》送上，敬请有关部门、当事人、知情人审核和补充修改，提供重大农业历史事件的知情人、当事人等线索，撰写反映重大农业历史事件来龙去脉的纪事本末体文章或亲历的重大农业历史事件的回忆文章，把历史留给后人！

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在撰写、核校共和国农业史料方面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将永载史册，后人定会感谢您！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

目 录

• 中国共产党与“三农”问题 •

毛泽东关于“三农”问题的思想.....农业部写作组(1)

万里与农村改革在安徽的兴起.....王郁昭(12)

• 制度变迁 •

50至60年代限制农民的有关政策.....姚监复(18)

革命根据地新富农问题研究.....苏少之(20)

我国农村经济组织建设研究.....课题组(42)

常熟市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及相关问题辨析

——以4个村为个案.....郑有贵(74)

从清苑县乡镇企业的发展历程看政府管理的得失.....朱文强(82)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结构与变迁.....宋士云 苏少之(94)

政府干预与中国农业保险的发展.....赵学军(111)

• 国际合作 •

1983年联合国在中国召开农村综合发展研讨会.....朱丕荣(125)

世界银行的农业贷款在中国的合作项目.....朱丕荣(130)

中外农业品种资源交流成果的一些情况.....朱丕荣(135)

粮食问题是国际社会关注的大事

——20世纪下半叶两次召开世界粮食会议.....朱丕荣(139)

• 人物传记 •

永恒的怀念——忆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博士.....李君凯(142)

• 大事记 •

2002年农业大事记.....焦红坡(168)

毛泽东关于“三农”问题的思想

——纪念毛泽东诞辰 110 周年

农业部写作组^①

摘要 本文对毛泽东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思想进行了探讨。分析指出，毛泽东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不仅勾画出“三农”现代化的宏伟蓝图，而且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其实现的路径。关于农业问题，毛泽东把农业技术改造、机械化、生态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等纳入现代农业的范畴，并提出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首位，倡导通过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力，以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关于农民问题，毛泽东主张增加农民收入、关心农民生活、保护农民财产、提高农民文化科学素质，以调动农民积极性和创造性。关于农村发展问题，毛泽东倡导城乡协调发展，形成了城乡兼顾、缩小城乡差别、城乡互助、在农村办工业和小城市等认识。本文认为，毛泽东关于通过农业现代化建设、在农村办工业和小城市解决“三农”问题的构想，是很有前瞻性的，这对于实施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思路，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指导意义。

从农村走出来的知识分子——毛泽东，是非常熟悉农业、农村、农民（本文简称“三农”）问题的领导人之一。毛泽东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不仅勾画出“三农”现代化的宏伟蓝图，而且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其实现的路径。从 1950 年的七届三中全会至 1962 年的八届十中全会，就有 6 次对农业问题做出专门决议，平均约两年一次，这反映出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集体对解决“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毛泽东关于“三农”问题的思想极其丰富，是宝贵的财富。

一、关于农业现代化

毛泽东较早提出了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并提出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首位，倡导通过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力，以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

（一）勾画出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

早在全国解放前夕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了要及时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任务，指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②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勾画现代化建设蓝图时，

^① 柯炳生、宋洪远参与讨论，郑有贵执笔。

^②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 6 月版，第 1432 页。

把农业现代化列为国民经济中3个现代化之一，指出：“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①。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又说：“讲到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当然，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但是在这个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②

毛泽东对什么是现代农业作了积极探讨。从已知文献中看，毛泽东没有对什么是现代农业作出明确的界定，但他把农业技术改造和机械化纳入现代农业范畴则是非常明确的。早在农垦事业创建初期，毛泽东就指出：共产党宣言的十大纲领中，有一条就是建立农业产业军，所以要开垦荒地，建设一支采用现代化机械和科学技术的农业大军^③。1955年7月，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强调：“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④毛泽东在报告中还向全党发出了用20-25年的时间完成农业技术改革的号召，指出：“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大概需要四个至五个五年计划，即20年至25年的时间。全党必须为了这个伟大任务的实现而奋斗。”^⑤毛泽东关于积极推进农业技术改造的思想，是当今科教兴农战略形成的思想基础。50年代末，毛泽东用了很多精力对农业技术改造和机械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论断，如以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为内容的“农业八字宪法”（1958年），“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1959年）。在农业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毛泽东特别重视推进农业机械化问题。早在1937年，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就指出：“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⑥1958年11月10日，毛泽东在对《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修改和信件中，将机械化列为农业工厂化的主要内容，指出：“要使人民公社具有雄厚的生产资料，就必须实现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即机械化和电气化）。”^⑦1962年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确定：“我们党在农业问题的根本路线是，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是在农业集体化基础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66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布置到1980年基本实现机械化的任务。此后，又于1971年8月和1978年1月，先后召开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以加快农业机械化的进

^①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

^②《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310页。

^③农业部政策研究会：《毛泽东与中国农业》，新华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222页。

^④《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一九四九—一九五七）》（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374页。

^⑤《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一九四九—一九五七）》（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374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11页。

^⑦《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15页。

程。

受国际上石油农业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形成了以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和化学化为内涵和特质的农业现代化的技术路线^①,而这一技术路线在20世纪60-70年代的实施过程中则以农业机械化为核心。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否认毛泽东把生态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纳入了现代农业的范畴。1959年毛泽东指出:“要使我们祖国的河山全部绿化起来,要达到园林化,到处都很美丽,自然面貌要改变过来。”^②“我们现在这个国家刚刚开始建设,我看要用新的观点好好经营一下,有规划,搞得很美,是园林化。”^③“农业生产必须依靠有机肥料,有机肥和无机肥料相结合。”^④“光靠化学化来得到稳定的丰收,有危险。”^⑤“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农、林、牧三者相互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⑥这些思想,对于当今我们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二) 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首位

如何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这是新中国面临的重大课题。毛泽东主张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首位,正确处理工农业发展关系,夯实农业的基础地位,进而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把农业列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地位和基础地位。早在1942年12月,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中就明确指出:“应确立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手工业、运输业与畜牧业为第二位,商业则放在第三位。”^⑦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初步提出了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指出:“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就给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⑧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进一步指出:“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⑨可见,毛泽东对农业社会化在社会主义中的基础地位的认识是深刻的。1960年3月,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农业是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1960年8月10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一个普遍规律”^⑩的论断。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对“四化”的内容和排列次

^① 1959年10月18日中央批转农业机械部的报告,批示明确提出:“应该根据从1958年起以10-15年的时间实现农业现代化,即实现农业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编:《毛泽东论林业》,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第2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编:《毛泽东论林业》,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第8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第313页。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第733页。

^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73页。

^⑦ 《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813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16页。

^⑨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77页。

^⑩ 引自夏远生所著:《毛泽东“农业为基础”思想的发展述略》,《安徽省委党校学报》,1990年第4期。

序作了调整，把农业现代化建设列为四个现代化的首位，指出：“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来说，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①改革开放以来，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在全党、全社会形成了“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的共识。

贯彻“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首位这一指导思想，关键是在投资上处理好工业与农业的关系。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现在的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②“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重视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帐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③1959年7月2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开幕时强调工业和农业之间的综合平衡问题，指出：“过去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是重轻农，现在是否提农轻重，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1962年7月20日，毛泽东在与各大区书记谈话中指出：“我发了一道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提出四年了，就是不实行。既不请示，也不报告。如果你们不实行，我兼计委主任，你们作副的，到哪里都可以革命么。”^④改革开放前，在实施国家工业化战略及为之服务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毛泽东关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思想在实践中没有得到很好落实。半个多世纪的实践反复证明，不能忽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必须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工作的首位，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否则，工农业发展关系失衡，农业现代化进程受阻，并导致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波动。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十二亿多人口，九亿在农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稳住农村这个大头，就有了把握全局的主动权。”这是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必须记取。

（三）组织起来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在如何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问题上，毛泽东主张组织起来，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①《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439页。

^②《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722页。

^③《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722-723页。

^④《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5页。

在这方面，毛泽东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毛泽东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将“合作化运动”列为14件大事之一。毛泽东主张组织起来，有很多动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认为组织起来可以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1943年，毛泽东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指出：“如果全边区的劳动力都组织在集体互助的劳动组织之中，全边区一千四百亩耕地的收获就会增加一倍以上。”^①1943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发表了《组织起来》的讲话，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②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又说：“土地制度获得改革，甚至仅获得初步的改革，例如减租减息之后，农民的生产兴趣就增加了。然后帮助农民在自愿原则下，逐渐地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及其他合作社之中，生产力就会发展起来。”^③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大力推进农业生产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就是实践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力的思想的具体体现。1958年11月，毛泽东在《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年）初稿的批语和修改》中写道：“我国人民面前的任务是：经过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形式，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全国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④

毛泽东对采取何种方式把农民组织起来，作了大量的积极的探索，或许可以说这是他在新中国“三农”问题上投入精力最大的问题。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主张合作社要采取自愿互利原则，实行民办公助；合作社要按股分红，社员还可以退股。换言之，毛泽东主张通过利益机制，以自愿和互利为原则，让农民通过收益比较决定是否入社。毛泽东还把群众是否自愿参加作为评判集体互助组织好坏的标准，他指出：“只要是群众自愿参加（决不能强迫）的集体互助组织，就是好的。”^⑤在组织起来的形式上，毛泽东主张合作社可以有多种形式，他说：“我们的合作社目前还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这又有几种样式。一种是‘变工队’、‘扎工队’这一类的农业劳动互助组织，……”^⑥此外，“还有三种形式的合作社，这就是延安南区合作社式的包括生产合作、消费合作、运输合作（运盐）、信用合作的综合性合作社，运输合作队（运盐队）以及手工合作社。”^⑦1955年至60年代初，毛泽东把大量精力投入到农业合作化和其后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期间，或在理论或在实践上，我国在如何组织起来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偏差，主要表现有：在组织形式上，实行单一化，只允许实行高级社

^① 《党的文献》，1997年第6期，第16-1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8年7月版，第88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78页。

^④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04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31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31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32页。

一种形式，到1958年则形成了单一的“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在参与原则上，脱离了自愿互利原则，实际上是用反倾向斗争形成的压力，取代了耐心的说服和经济的引导。如此，使得改革开放前的农业和农村经济缺乏生机和活力，以致现在社会上仍“谈合色变”。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否认毛泽东关于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力这一主张的正确性。组织起来，发展规模经济，这是经济规律。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广大农民在寻求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矛盾过程中，因地制宜推进产业化经营，并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各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既解决了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又形成规模经济，使农业朝着规模化、专业化方向健康发展，进而推进了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二、关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and 创造性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其核心是农民问题。毛泽东高度重视农民问题，是因为他对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毛泽东认为，“农民是农业的根本，也就是中国的根本。”^①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从多个方面阐述了农民的重要地位。在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农民运动时，毛泽东指出：农民占中国人口的80%以上，是革命的主力军，中国革命若没有他们参加，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中国以农业为主，农民是生产的主力军；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几百次农民起义，是一种伟大的力量，如果有共产党的领导，农民的力量之大是可以意料的。因此，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1943年8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是农民，我们讲的人民主要是农民。”^②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更明确提出：“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③

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一如既往地高度重视农民问题。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④

正是基于对农民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有重要作用的认识，毛泽东十分重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and 创造性。1958年5月13-14日，毛泽东在对刘少奇八大二次会议工作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时指出：“在我国的6亿多人口中有5亿多农民，他们无论在革命斗争中和建设工作中都是一支最伟大的力量，我国工人阶级只有依靠这个伟大的同盟军，把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地调动起来，才能取得胜利。”^⑤这一思想，体现在增加农民收入、

^① 《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67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5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078页。

^④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73页。

^⑤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23页。

关心农民生活、保护农民财产、提高农民文化科学素质等诸方面。

（一）增加农民收入

增加农民收入，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条件。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指出：“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①

毛泽东主张逐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十分注重通过实行合理的农产品收购价格来实现农民增收。1950年下半年，各地纷纷反映，由于农业生产恢复较快，农产品出现供过于求的现象，粮食价格下降，市价已低于牌价，工业品及纱布价格上升，农民不满意。华北局在9月19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国家可否按照牌价大量收购粮食（全国不惜积压50亿至60亿斤）和适当降低工业品价格。毛泽东为此批示：“我认为华北局的意见是正确的，请陈（云）、薄（一波）即根据华北局所提各项召集有关人员开会，拟出具体方案，于数日内向中央报告一次，并迅即推行。此事极为重要，不能久延不决。”^②农产品价格是一个涉及众多利益主体的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调整价格，就是调整工人和农民之间、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经济关系。”^③因此，尽管因实施工业化战略而要求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但毛泽东注意到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要把握好度的问题，即既主张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又主张农产品收购价格不能太低，要逐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1956年，毛泽东在全国人大二次会上说：“如果现在要求完全消灭剪刀差，做到等价交换，国家积累就会受到影响，但是剪刀差太大，使得农民无利可图，那也是错误的。总之，在不影响国家积累的情况下，逐步地缩小剪刀差价。”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农业本身的积累和国家从农业取得的积累，在合作社收入中究竟占多大比例为好？请大家研究，议出一个适当的比例来。其目的，就是要使农业能够扩大再生产，使它作为工业的市场更大，作为积累的来源更多。先让农业本身积累得太少或者没有积累，竭泽而渔，对于工业的发展反而不利。”^④1959年毛泽东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指出：“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不能够完全等价，但要相当地等价。”^⑤1964年11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还提醒说：“谷贱伤农，你这个粮价那么便宜，农民就不种粮食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⑥

毛泽东注重通过合理的价格政策调动农民积极性，是吸取了苏联的教训。1956年毛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728-729页。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商业卷)，中国物资出版社，1995年版，第563页。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第490页。

^④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上的讲话》，1957年1月27日。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第493页。

^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他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那有这样的道理！”^①

（二）关心农民生活

毛泽东十分关心农民生活。1952年10月14日，陈云将一份关于江苏省青浦县小蒸乡农民情况的调查报告报送毛泽东并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该报告反映由于农业歉收、征粮过重和人多地少，农民生活普遍困难。15日，毛泽东写信给谭震林，要求认真解决此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关心农民生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给农民留足粮食。在农产品统购数量问题上，毛泽东反对高征购，批评高征购是竭泽而渔。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历来都是好的，但是在粮食问题上曾经犯过一个错误。一九五四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我们却多购了七十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闹得去年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农民有意见，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我们发现了缺点，一九五五年就少购了七十亿斤，又搞了一个‘三定’，就是定产定购定销，加上丰收，一少一增，使农民手里多了二百多亿斤粮食。这样，过去有意见的农民也说‘共产党真是好’了。这个教训，全党必须记住。”^②1966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给刘少奇的信中，以苏联和中国“大跃进”时期的教训为鉴，深刻地指出：“苏联的农业政策，历来就有错误，竭泽而渔，脱离群众，以致造成现在的困境，主要是长期陷在单纯再生产坑内，一遇荒年，连单纯再生产也保不住。我们也有过几年竭泽而渔（高征购）和很多地区荒年保不住单纯再生产的经验，总应该引以为戒吧。”^③

（三）保护农民财产

毛泽东反对对农民实行剥夺，主张保护农民财产。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农村发生了以“一平二调”为主要内容的“共产风”，生产大队、生产队、农民的财产被无偿调用举办社办企业等。1960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对这种“共产风”进行了严厉批评，并要求坚决进行退赔。他说：“退赔问题很重要，一定要认真退赔，……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的东西都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都没有，公社只要有几个人、几间茅屋能办公就行。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它不是白手起家的，是‘黑手’起家的。所有县、社的工业，房屋，其它财产等，凡是平调来的，都要退赔，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县、社干部可能会不满意，但是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群众，得到农民满意，得到工农联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727-728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727页。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

盟。”^①

（四）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毛泽东主张通过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解决“三农”问题。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明确提出：“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②1955年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毛泽东为《酒泉县银达乡是怎样进行农民业余文化教育的》一文加写的按语，对该乡根据农事季节安排学习时间，注意解决工、学矛盾，教学内容切合农民实际等做法给予充分肯定。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中，提出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12年内，基本上扫除青年和壮年中的文盲，普及小学教育。要求做到一般的社有小学和业余学校，一般的乡有农业中学，以便进一步提高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文化水平。1959年，毛泽东提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毛泽东关于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思想，对于当今解决“三农”问题，使传统农民成为现代农民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三、关于农村发展

在农村发展方面，毛泽东倡导城乡协调发展，形成了城乡兼顾、缩小城乡差别、城乡互助、在农村办工业和小城市等认识。

毛泽东关于城乡兼顾的思想早在党的工作重点转入城市之前即已形成。1949年3月5日，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党的工作重点即将由农村转入城市的历史性转折之际，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醒全党：“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③

毛泽东一贯主张缩小城乡差别，并将其提高到巩固工农联盟的高度来认识。在1959年2月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工人在城市里建设，农民在农村里建设，农民要和工人一面合作，一面比赛，把农村也改造得和城市差不多，这才是真正的工农联盟。”

毛泽东主张城市要支援农村，工业要支援农业。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④这一思想全面地体现在他亲自主持制定的《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纲要》序言指出：“农业生产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依靠农民自己的辛勤劳动。但是，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总是尽可能援助农民的。纲要所规定的许多农业增产措施，今后将逐步得到人民政府的更多的必要援助。在实际上，

^①《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2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1077—1078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27页。

^④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上的讲话》，1957年1月27日。

这是工农的互相支援，城乡的互相支援。”“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和工农互相支援，是农民解放的保证。”^①这里，把工农互相支援、城乡相互支援提到“农民解放”和“巩固工农联盟”的高度来认识。

城乡结构如何布局，是关系能否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重大因素之一。农村人口是往大中城市里迁移，还是在农村办小城市，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大的转变。早年，毛泽东主张农民进城、当工人。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②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发生了转变，主张在农村办小城市，这是基于如下四点考虑：其一，从国家现代化建设层面考虑。在1959年2月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在农村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将来有一半劳力搞工业，这样我们的国家就象个样子了。”其二，从大城市承接能力考虑。1959年，毛泽东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指出：“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这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③其三，从大城市的安全考虑。1959年，毛泽东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指出：“将来的城市可以不要那么大。要把大城市居民分散到农村去，建立许多小城市。在原子战争的条件下，这样也比较有利。”^④其四，也是最基本的，即毛泽东关于在农村办工业和发展小城市，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来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是基于对国情的深刻认识的。毛泽东分析指出：“我国有一个特点，人口有六亿如此之多，耕地只有十六亿亩如此之少，不采取一些特别办法，国家恐怕搞不好。”“中国农村有五亿多农村人口从事农业生产，每年劳动而吃不饱，这是最不合理的现象。美国农业人口只占13%，平均每人有二千斤粮食，我们还没有他们多，农村人口要减少怎么办？不要拥入城市，就在农村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

毛泽东主张在农村办工业。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提出地方工业要超过农业产值。会后，国家经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起草了《关于发展地方工业的意见》，提出：“在干部中应该提倡，既要学会办社，又要学会办厂。”“农业社办的小型工业，以自

^①《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一九四九—一九五七）》（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760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78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第197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第739页。

产自用为主，如农具的修理，农家肥的加工制造，小量的农产品加工等。”这是第一次提出“社办工业”这一概念。毛泽东主张在农村办工业，既考虑到工农并举、大中小结合因素，又考虑到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问题。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指出：苏联“他们不工农并举，反对大中小并举。我们是大小结合，基础放在小的上，靠地方，靠小的。”“农业社也可以办加工业。”“苏联的集体农庄，不搞工业，只搞农业。”我们“过去想过，赚钱的工业要乡政府搞，不要合作社搞，这有点斯大林主义残余。”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①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社办工业获得了很快的发展，“成千成万的小工厂在农村雨后春笋般地兴建了起来”，但多数是靠刮“共产风”发展起来的。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了解决全国人民吃饭这个第一位的难题，毛泽东和中央决定社队一般不办企业。1962年9月，中共中央在《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规定：“公社管理委员会，今后若干年内，一般不办企业。”同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发展农村副业生产的决定》中明确规定：“公社和生产大队一般不办企业，不设专业的副业生产队。”国民经济恢复后，1966年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指出：“农民以农为主”，“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②。1975年9月27日，毛泽东看了浙江省周长庚请求中央动员全党和全国各条战线支持社队企业发展的信后，批给邓小平：“请考虑，此三件^③可否印发在京各中央同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将其印发至全国县市以上各级党组织。同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头版通栏发表题为《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的社论和全文转载《河南日报》报道回郭镇公社发展社办企业经验的文章，引起全党和全国各级领导的注意和重视。正是在毛泽东关于农村办工业的倡导下，改革前苏南等地的社队企业在极其艰难的体制环境下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这为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民建设小城镇，进而走上了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协调发展的道路，这证明了毛泽东关于“三农”现代化的构想，是很有前瞻性的。毛泽东关于在农村发展工业和小城市的思想，对于实施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思路，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指导意义的。

^①《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529页。

^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54页。

^③指周长庚的信、华国锋给河南省委的一封信和《河南日报》登载的关于巩县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调查报告。

万里与农村改革在安徽的兴起

王郁昭

1992年邓小平同志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万里同志是立了功的”。在万里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我有幸参加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些具体工作，感到十分欣慰。下面我想谈一谈对万里同志领导安徽农村改革中的几个关键问题的感受。

一、发展农业的关键是制定正确的政策，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1977年6月，中共中央改组了安徽省委领导班子，派万里同志任省委第一书记。我当时在滁州地委工作。当时，“四人帮”已被粉碎，但安徽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却捂了8个月的盖子，“两个凡是”的思想仍在盛行，十年动乱造成的恶果远未消除，农村经济濒于崩溃，派性林立，形势动荡不安，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万里同志到安徽以后，首先揭批“四人帮”，狠批派性，解放干部，调整了各级领导班子，形势急转直下，逐步走向稳定。紧接着省委把工作重点转向农村，转向农业生产。万里同志认为“安徽的问题关键在农村，农业上不去，就会影响全局。”他明确提出农村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正在这个时候，他在清理过去省委文件时，发现了滁县地委5月份向省委报送的《关于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万里同志很重视这个报告，随即批转各地、市委，指出“滁县地委组织力量深入群众，对农村经济政策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这是个好的开端。这个问题，很值得引起各地重视。报告中提出的意见，可供各地参考”。这是万里同志到安徽后，批转的第一个报告。

为了进一步了解全省农村的情况，万里等省委领导到农民中去，直接听取基层干部和农民的要求和意见，当时称为“麦场调查”。经过3个月的调查研究，形成了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决定”草案，并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对这个草案进行讨论。会议开始时，万里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中心的问题是研究当前农村迫切需要解决的经济政策问题，把农民发动起来，全党大办农业”。他指出“最重要的生产力是人，是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没有人的积极性，一切无从谈起……调动人的积极性要靠政策，只有政策对头，干部带头……群众就会积极起来，农业就能上得快”。会议通过了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决定》，即安徽省委著名的6条决定。这个决定冲击了许多禁区，是政策上的拨乱反正，受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和欢迎。为此，《人民日报》发表了姚力文同志的《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重要文章。邓小平同志曾多次提到安徽省委的6条决定，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6条决定的公布，标志着安徽省乃至全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已被拉开。

紧接着万里同志又深入到农村进行调查，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讲话。他特别肯定了滁县地区定远县纠正过去农业生产“瞎指挥”的做法，有水种水稻，无水种旱稻，全由生产队自主决定的做法。他指出“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实际上是个尊重实际、尊重群众，发扬民主，反对官僚主义瞎指挥的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不尊重生产队自主权，这是我们过去农村工作中许多错误的根源”。为此，《人民日报》发表了“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必增产”的重要文章，并加了编者按。在全国有很大影响。

二、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不断推动农村改革深入发展

安徽的农村改革，经历了农业生产责任制由不联系产量到联系产量，由包产到组到包干到户的发展过程，它充分表现出农民群众生气勃勃的首创精神。

1978年安徽遭遇到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旱灾。9月初滁县地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布置生产自救工作。那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已经进行了几个月。两个“凡是”的观点已受到质疑，各级干部的思想已经活跃起来。会上，许多公社干部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农业长期上不去，原因究竟在哪里？我们一个公社上不去，两个公社上不去，为什么全地区240多个公社都上不去？难道我们这些公社书记都是笨蛋吗？难道只有外国人和大寨的人才聪明的吗？他们强烈要求地委解放思想，放手让下面干，干好了不求有功，干坏了自动下台。在分组讨论时，来安和天长县一些公社介绍包产到组，小宗作物田间管理包产到户，以及对基层干部按工作实绩进行奖励等行之有效的3种办法，引起了与会干部的很大兴趣。当时这些办法都是禁区，称为“秘密武器”，只能暗中实行。

这3个“秘密武器”都是实行联系产量的责任制。第一个是来安县烟陈公社杨渡大队魏郢生产队在贯彻落实省委“六条决定”时，开始实行包产到组，以产计工，增产奖励，减产赔偿。1978年大旱，其他生产队大都减了产，唯有这个生产队增了产，粮食产量由8.8万斤上升到12万斤，增长38.9%；油料创历史最高水平；社员收入增长30%。第二个是天长县新街公社，在抗旱中眼看棉花苗将要枯死，便实行了棉花包产到户责任制，每户分几垄子棉花，为了抗旱保苗，社员早晨连洗脸和刷牙的水都用于抗旱，结果这个公社棉花产量由上年的29斤上升到55斤，增长89%。第三个是来安县广大公社把全年粮棉油、猪禽蛋等生产指标量化为指数，对基层干部实行岗位责任制，年终按实绩进行奖罚，大旱之年生产全面增产。

这年的11月份我到合肥有事，万里同志知道后找我去谈谈农村情况。从晚饭后7点钟谈到10多点钟。这是我和万里同志第一次面对面的谈话。我当时把农村存在的问题和抗旱救灾的情况以及上述3个“秘密武器”作了详细的汇报。万里同志听了汇报后非常高兴，他对农民创造的“三个典型”非常重视，要我回去后把“三个典型”作详细的调查，向省委写出书面报告，并派新华社记者参加调查。

万里同志看了3个调查报告后，随即通知滁县地委可以进行试点。为此地委发了96号文件，将3个报告印发全区，要求各县在一个大队或一个公社先进行试点，待取得经

验后逐步推广。哪知道文件下发后，各县纷纷要求扩大试点范围，许多社队都争当试点。随后，一些不是试点的社队也自发地搞起包产到组，形势急转直下。这其中凤阳县城南公社的岳林大队岳北生产队分4个作业组，年终时，该给国家的送给国家，该给集体的提留送给集体，剩下的由作业组进行分配。这就是当时的大包干到组，当时流行的一个顺口溜说“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既省事，又简单，干部满意，社员喜欢”。到1979年全区实行包产到组，大包干到组的生产队已达68.3%。

“双包到组”的推行，伴随着激烈的争论。除省内议论纷纷，有的人说王郁昭的胆子太大，迟早要倒霉，有的好心人带信给我，说这种办法不能搞，搞不好是要犯错误的。有的认为滁县地区复辟了资本主义，这种争论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甘肃张浩的读者来信，标题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他认为“现在实行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适合当前农村的情况，应当稳定，不能随便变更。轻易地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是脱离群众的，是不得人心的，同样会搞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挫伤群众的积极性，给生产带来危害……”作者认为搞包产到组，是“三级半所有”。报社加了编者按，提出“要坚决纠正”。

这封读者来信发表后，并在中央台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无疑对滁县地区搞“包产到组”的农民来说，是当头泼了一瓢“冷水”，引起很大震动。很多人认为编者按“有来头”，惶恐不安，认为滁县地区又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当时在嘉山县视察工作，吃早餐时，听了广播后立即返回地区，并用最快速度的办法，向各县委发了电话通知，指出“当前正值春耕大忙季节，各种形式的责任制，一律稳定下来，不要变来变去，以免延误农时”，“各种形式的责任制是地委同意试验的，如果错了，完全由地委负责”。

正当滁县地区广大干群受到重大压力时，3月16日万里同志来到滁县地区，在全椒县古河区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后，他说“作为报纸，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读者来信是可以的。别人写读者来信，你们也可以写读者来信”。“这好比公共汽车，你可以打票上车，我也可以打票上车”，“究竟什么意见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要靠实践来检验，决不能因读了一封读者来信和编者按，就打退堂鼓”。“产量上不去，农民秋后饿肚子，是找你们县委还是找报社？报社是不会管饭的”。“三级半有什么不好？这是核算嘛，四级核算也可以，家庭也要讲核算，那不是五级核算了吗？”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地委做的对，及时发了通知，已经实行的各种责任制一律不动，只要今年大丰收，增了产，社会财富多了，群众生活改善了，你们的办法明年可以搞，后年还可以搞，可以一直搞下去。”“凡是能增产，对国家贡献多，集体经济壮大，群众收入增加，生活得到改善，就是好办法。”听了万里同这的这番话，大家情绪稳定了，对推行各种形式的责任制的信心劲头更足了。

三、满腔热情支持小岗生产队首创的大包干到户责任制

1979年，随着双包到组的发展，也出现了一部分生产队暗中搞了包产到户的责任制。